

施蛰存与《待旦录》

韦 决

一直喜欢施蛰存先生的文字,淡然,随性而又隽永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接触文化老人,也动过想去看望他的念头,后来不知怎么没去成,就成了终生遗憾。这不妨碍我通过阅读他的作品,了解他走近他。当海得他早年的旧著《待旦录》时,我的欣喜之情实在无以名状。

《待旦录》于“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初版”,列入“刘以鬯主编的怀正文艺丛书之四”,由上海江苏路九十九号的怀正文化社出版。丛书共分八种,都是沪上名作家如许钦文《风筝》,李健吾《好事近》等。此书共收文二十三篇,分两辑,第一辑十一篇,第二辑十二篇,作者写有《序》,他说道:“这是我在抗战八年中写的散文中的一部分,其他的散文,差不多皆已散失,有的是印本在旅行或流徙中遗失的,有的是原稿写出去之后,便无踪影的,有的是发表以后没有剪存,以至现在无法寻觅的。在戎马仓皇中,一个人要保留他自己的一些文字,也真不容易。”这多少说出了抗战艰难时期,不但生活极不稳定,东迁西走,作为作家,也难以保存好自己的笔记财物,等到要编一本抗战中写下的文字,就颇为不易。最后,施蛰存写道:“应当说明的是书名的涵义。我对于抗战大业,并没有尽过参加作战的责任,所以不是取‘枕戈待旦’的意。这个‘旦’字,只是《卿云歌》中‘旦复旦兮’的意思,或者《诗经》里的‘女曰鸡鸣,士曰昧旦’的‘旦’字。”这样,这个书名就带有自强和兴旺的意味了。

《待旦录》中的第一辑,可视为文艺杂谈。其中一些文章在发表的当时,就引起过文坛的争论。如《新文学与旧形式》《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》,因为有人提出异议,他为此多写一文。主要意思是,新文学的作家,如要参与文学大众化的运动,一是提高大众的文学趣味,二是从新文学本身中去寻求能接近大众的方法,也即抛弃旧文学旧形式的俗文学。其实,旧形式如章回小说、平剧脚本、弹词小调等等,正是旧文学向新文学的一种过渡。施蛰存所说:“不要把这种现象认为是新文学的一条康庄大道。”这诚是施先生的一家之言。

言,他强调的是小说、诗歌、戏剧等纯文学的文学性而不是宣传。可见施先生是心直口快之人,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。

这让人想起施先生与鲁迅先生交恶的往事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鲁迅以“丰之余”的笔名,写了《重三感旧》,发表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施先生也在该报发表《〈庄子〉与〈文选〉》,因正巧有编辑请他填写介绍给青年的读书表格,施先生填了《庄子》和《文选》,结合鲁迅的文章,他说“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,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。我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《庄子》《文选》一类的古文”。鲁迅见之又撰文反驳,强调青年人不必沉溺于古文里。一来一去,都没有好听的话,互相嘲弄和攻讦。以至于施成了鲁迅笔下的“洋场恶少”。晚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起此事,还愤愤不平地说:“被鲁迅踢了一脚。”但他并没有过多计较,一直保持对鲁迅的敬重,还在他主编的《现代》杂志上,发表了鲁迅的重要文章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,因为他“觉得鲁迅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,应当发表”。

还说《待旦录》。此书第二辑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,他说:“只有《老兵的小故事》一篇,是诗,不是散文,照理不应该编在这里。但是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,确是把它作为散文写的,我自己又喜欢它,不愿意割爱,所以这里是它最适宜的安身处了。”但从形式上看,它确实是诗,每节五行,共十五节,而最后一节却只有四行,总计就是七十四行。作者用的是顺口溜的民歌形式,完全的口语化,开头写道:“三十岁年纪该不算大/可是人家叫俺老兵也不差/前七年剿匪后三年把日本人打/说好听些,也就是十年戎马/唉,这络腮胡子三个月才一刮。”全诗读来朗朗上口,内容通俗易懂。无论如何,是应归入诗的行列的。既然作者把它编入散文,那是可以理解的,那是散文的诗,或诗的散文。其他各篇散文,如《跑警报》《山城》《河内之夜》等,都是作者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,居无定所,游西走东,在极不稳定的漂泊中,写下的辛酸文字:“跑警报的时候是唯恐敌

机来得快,而事实却真是侥幸地老是不来。始终是谁也没有躲进防空壕去,便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了。那是一个得到了安慰的病人的叹息,于是荒山上的人们也随着轻松地长叹着,提起行李回城了。”这样的文字,从一个侧面,写出了平民在抗战中的困苦。

施蛰存(1905—2003)字蛰存,号梅影轩主,无相庵等,原名施德普,笔名施青萍、安华、施二等。虽生于杭州,但从8岁起就跟着父亲施亦政来到松江。父亲先后任江苏师范学校文牍、检察兼掌书(图书馆主管),母亲系松江人。他在松江(华亭)县立初等小学、省立第三中学完成学业。之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,又进入上海大学、大同大学等。每逢寒暑假必回松江,读书写作,进行外国文学翻译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下,施蛰存与好友戴望舒、杜衡三个共青团员,被列为“共党嫌疑分子”,只得仓皇离校。他悄悄潜回松江,后在省立松江中学执教,借此暂避风头。他曾回忆道:“一星期后,我回到松江家里,隐居小楼,杜门不出,每日阅上海报纸,慨叹时事。”第二年,在松江他与陈慧华举行婚礼,丁玲、胡也频、沈从文等好友从市里赶来祝贺。在松江,他走上了文学之路,与冯雪峰、戴望舒、杜衡组成“我们的文学工场”,筹备《文学工场》杂志。他自述一生开了四扇窗,东窗是文学创作,南窗是古典研究,西窗是外国文学,北窗是碑版整理。四扇窗都是明亮且成果斐然。而散文杂谈的创作,只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分支,亦成绩不凡,1937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《灯下偶拾》,这是他的第二本散文集。

据这套丛书主编刘以鬯先生回忆:“我那时也给施蛰存出过小说,戴望舒的稿子也是他转给我的。他住在愚园路,就在我家后面,所以他有时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给我。”当年设在刘以鬯家中的怀正出版社,就在江苏路,朝北走一小段路就是愚园路,右拐弯就是施先生的家。两人确实住得十分近,联系方便友情深笃,这才有了这本今天看来异常珍贵的散文集。

毛泽东与侯绍裘

谭俊生



侯绍裘(1896—1927)烈士是松江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,1923年秋入党。1927年4月10日,在南京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他的革命事迹在松江广为流传,他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人们。《松江报》《松江史志》《上海老年报》都曾做过详细报道。

近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《毛泽东年谱》(1893—1949上卷),见有几条记载毛泽东与侯绍裘工作交往的文字,都是我不曾读过的史料。现录于下,并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和我读后的感受。

其一(毛泽东在1924年)“春 和罗章龙并邀在上海松江中学教书的侯绍裘[1]一道,由黄浦江边码头乘小艇到松江县,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工作。”(年谱124页)

“[1]侯绍裘,当时任国民党上海第4区党部负责人。”(年谱124页)

读了这一条,使人了解到当时毛泽东与侯绍裘的工作关系和友谊都很密切。

当时中国共产党三大开过不到一年,中央有规定,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。中国国民党刚开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局委员,又是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。罗章龙也是中共中央执行局委员。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、罗章龙、王荷波、恽代英四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。派沈泽民、邵力子、瞿秋白、施存统、邓中夏、向警予、张秋人等共产党人参加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。侯绍裘则是执行部领导下做基层工作。当时这一批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精英,把统一战线搞得风生水起,红红火火。

此时此刻可以想象,毛泽东与侯绍裘在黄浦江上泛舟,谈工作,也聊天。他们会谈到黄浦江。由此,毛泽东谈广州珠江、长沙湘江、岳麓书院,爱晚亭前,橘子洲头,感慨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。侯绍裘谈华亭鹤唳、三泖九峰、江东二俊、书画其昌、爱国诗人夏完淳,地灵润育人杰。他们小艇抒怀,谈今说古,雄视天下,同期世界大同,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聚会。

其二(毛泽东于1926年)“1月18日在国民党二大上,同丁君羊、侯绍裘等五位代表,受大会主席团指定,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[2]。经过修改的《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》,简短明了,更加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,19日被大会通过。决议案指出:‘中国之国民革命,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。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,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。’”(年谱151页)

“[2]此决议案为农民部部长陈公博、湖南等省代表易礼容、黄学曾、路友于、丁君羊起草。大会讨论时,有代表提出,此案文字太长,且偏重广东一省,要求增加审查委员,重新拟定,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个意见,由毛泽东等进行修改。”(年谱

151页)

读了这一条,可以了解到毛泽东与侯绍裘并肩作战,深入讨论,修改决议案,从思想上肯定农民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的性质和地位。他们五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其三(毛泽东在1926年)“4月13日列席国民党中常会。提出在上海开办农工日报的议案,拟请张静江为经理,张廷灏为副经理,柳亚子为编辑部主笔,沈雁冰为副主笔,侯绍裘、杨贤江、顾谷宜为编辑委员,获得会议通过[2]。”(年谱159页)

“[2]自上海《国民日报》变为拥护西山会议派的报纸后,上海即无由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党报。”(年谱159页)

读了这一条,可见毛泽东非常赞赏和信任侯绍裘。认为侯的鲜明政治立场和用文字战斗的能力都是非常好的。在毛泽东看来,柳亚子、沈雁冰和侯绍裘都是杰出的一流人物。

其四(毛泽东在1926年)“10月15—28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区市党部、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。……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的发展、迁都[1]、召开国民会议、国民党的最近政策等问题,通过了《联席会议决议案效力问题决议案》,《中国国民党的最近政纲》等。会议向全国发出宣言,重申继续执行第一次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[2]。”(年谱168页)

注[1]注[2]的文字都较长,这里就不全文录于下了。其内容主要是叙述14天的会议中,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斗争中取得大胜利。会上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,左派比此数稍多,再加半左派,人数占绝对优势,所提各议案也深得人心,右派中派节败下阵来。其中记载孙科有一段话与侯绍裘有关,特将原文择出:“孙科说:有些问题‘即要我于树德、毛泽东、恽代英、侯绍裘一疏通,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’。”(年谱168页)

读了这一条,可以了解到侯绍裘虽然是国民党江苏党部的代表,但在会议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。在孙科的眼中,于树德、毛泽东、恽代英、侯绍裘都是会议中最活跃最厉害的人物,最起作用的人物。用我们的话来说,他们是我党的中坚力量,在会议中联手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,取得了显著胜利。

读了以上几条后,总的感觉是侯绍裘烈士生前不仅在上海、苏州、南京等地出色地为党工作,而且在国民党二大上,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市党部、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上,与国民党右派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在这些重大斗争中,他受毛泽东指导,与毛泽东并肩作战,共同商酌战斗檄文,取得了成效,结下了友谊。

生活茶座

盛庆庆 书

改革开放后,我安装了上海第一部私人电话

可 燃

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辞去了静安区住宅公司的工作,下海自食其力当了个体户,并在原宝山拿到了001号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。那时我的主要业务是为房修公司、建筑公司做一些维修、安装的辅助工作。有些任务重、时间紧的业务,离不开及时的信息和沟通。出于工作联系方便的需要,1983年5月我向罗店电话局申请安装了一部电话机,安装费用300元。

那时一部电话月租费包月20元。电话机安装好的那天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即来我这作了录音采访,第二天,在《阿富根谈生产》节目中以标题《上海郊区农村,个体户装

了全市第一部家用电话》报道了这一消息。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反响。有人惊讶上海郊区的个体户不得了,家庭电话也装起来了;罗店当地的老百姓也议论纷纷,不少人干脆跑来看个究竟,大家觉得蛮稀奇。

罗店地区只有一条电话线,电话号码很特殊,661231,我们调侃说是66年的最后一天。罗店地区有十多个生产大队,每个生产大队只有一部电话,社员群众要打电话,必须到大队部去;加上企事业单位的电话,整个罗店地区只有上百门电话。从市区打进来的电话,必须通过电话局总机的话务员转接,而从罗店向外拨打电话,则要请总机话务员代拨号码。记得我家的电话号码是388,谐音是升发发。安装了这部电话机后,我业务量饱满,第一年上交国

家的税收就占了罗店地区个体户税收的三分之一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罗店电话由原来的3位数分机号码,增加到4位数,用户的电话机由电话局免费调换,换成带有转盘拨号功能的,同时升级为总机半自动接送电话,即区域内打电话可以直接拨号,区域外的仍需总机转接。1989年11月,整个上海市的电话号码都改为7位数,罗店地区也改成了直线电话。

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,电信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,1995年上海市的电话号码全部升为8位数,当时我开了一家大酒店,前面的4位区号是固定的,后面的4位号可以挑选,我挑选为7979,谐音即使“吃酒吃酒”,通俗易记,顾客盈门。

小戏之乡三代人(七)

唐亚生



的,由张宝福伴奏。第二次又淘汰了一部分,最后录取14人,算得上百里挑一。

经过精选以后,这支14人组成的男女青年成为新五文工团的第三代人了。接下来就是培训。那时新五文工团与上海沪剧团关系融洽,由公社文化站出面联系,上海沪剧团派出李文兴、顾传芳两位男女老师以

及一位蒋姓老师,李、顾两位老师主要传授男声、女声沪剧曲调演唱,蒋老师主要传授形体表演动作,为期三个月。其时新五公社对外交通不便,仅每天有一班汽船往返新五至松江县城,所以李、顾两位老师都住下来,公社专门在办公大楼三楼腾出两间房间作招待所住夜,蒋老师每星期定期来数天。

学员借住在原公社农机站,实行封闭管理;规定一律住夜,除星期天休息外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请假。每天清晨,学员起来各自练习吊嗓子。上午、下午由老师授课。经过三个月的培训,学员有演唱、表演的基本功了。培训班结束后,文化站又聘请上海音乐学院声乐老师薛天航来新五,定期传授演员的发声、运气等声乐方面的基本知识。

县文化馆每年举办沪剧培训班,新五文艺厂也每次选派两名演员(轮换)参加,时间最少两个星期,最多一个月,学员都住在县招待所。

平时,这些演员与其他印刷专业工人一样,从事印刷工作。如有节目排练,则集中排练一段时间。其中涌现了一批优秀演员,如张菊华、任桂花、朱仁英、干国芳、吴玉芳、朱菊英、夏菊花等以主角为主。顾丽云、徐小甫、诸炳仙、倪火根等以小生为主。女演员阵容比男演员更为雄厚。

1982年,作为新五文工团的第三代演员第一次登台演出,由沈孝慈创作的沪剧小戏《气煞猫》,由顾丽云、徐小甫、干国芳主演,参加松江县群众文艺汇演,获创作、表演二等奖。

1983年,为参加松江县庆国庆群众文艺创作节目汇演,编排两个沪剧小戏。由赵政创作的沪剧小戏《得奖之后》,第二代演员戚广龙与第三代演员干国芳主演。《归农门》获三等奖。《得奖之后》还在上海《小舞台》发表。

1986年,由钱勇赴创作的沪剧小戏《得救》,后改名为《井台泪》,由顾丽云、朱菊英、李全英主演。在参加松江县法制文艺

会演中获创作奖。此后,《井台泪》在县法制文艺专场巡回演出23场。

1990年,由沈孝慈创作的小品《鞭墓》,由县文化馆安排一名男演员,在华东大赛上海赛区会演获三等奖。

1991年,由沈孝慈、徐林祥合作创作的沪剧小戏《荷花缸》,由张菊华、李全英、杨峰(外借)主演。在第三届上海十月业余剧展获演出奖。

1992年,由沈孝慈应中国农业银行松江支行支行的要求,创作了上海说唱《飞不走的人民币》,由县文化馆安排演员参加上海第六届“农行杯”广播赛,获最佳节目奖。

其间,也排演大型沪剧,如传统沪剧《借黄康》,由张菊华、顾丽云、徐小甫、朱慧英、李全英等主演。传统沪剧《庵堂相会》由张菊华、任桂花、倪火根、李全英等主演。传统沪剧《董府血泪》,由吴玉芳、张菊华、顾丽云、任桂花、朱菊英等主演。有时演员力量不够,少数也有外借。

新五文工团的第三代演员,经过三四年艰辛历练,有多位演员脱颖而出,演艺水平已接近专业剧团演员水平。其中张菊华无论在唱腔、对白、动作等,已显功底深厚的优秀青年业余演员特质。1985年,由陆军创作的大型沪剧《瓜园里的年轻人》,县文化馆抽调各乡镇文艺骨干组建业余剧团,张菊华作为业余文艺骨干在剧中饰演杏花。

同年,张菊华被崇明沪剧团聘用,聘用后参加了第一个大型沪剧《东方女性》表演。两年多后,崇明沪剧团解体。虽然时间短暂,但不管怎么说,她经历了一段专业剧团的生涯。(待续)